

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研究

庄 曦

【摘 要】 老年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老去的过程是逐渐失去对身体控制的过程;同样也是既有社交圈趋向新社交圈转移的过程。因此,考察老年群体问题,离不开健康和社交这两大主题。近年来,老年群体的社交平台逐渐向新媒体迁移,且增率渐长。但面对网络良莠不齐的信息时,老年人依然难免陷入新媒体“难民”的困境,成为虚假信息的重灾区。本研究尝试以微信平台为例,探讨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特征,进而帮助老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更多地增能获益。研究得出:老年群体的新媒体应用聚焦于熟人社交,其网络信息的接触与鉴别对社交网络依赖程度较高;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传播中的高度社交依赖,容易引发信息认知的内卷化;老年群体数字媒介素养问题严峻,亟待量身定制式的信息干预。

【关键词】 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活跃程度;媒介偏好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群体已成为当下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以群体年龄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状态,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曾确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了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0.2%,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6.96%”。^①到2015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的10.5%”。^②2019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49亿人,预计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4.87亿。可见,我国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且速度也相当之快。

庄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7)。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老年群体的互联网社会支持”(16TQB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17BXW10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的研究成果。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房心怡同学对于本文的写作也有贡献,特此致谢。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2001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5rp/index.htm>。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人们惯于以年岁来界定老年,但从心理学及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老年的阶段性特征并不能以绝对的年岁为界限,老年意味着一定的心理发展程度以及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老年是自我妥协与对话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去的过程亦是逐渐失去对身体控制的过程;另一方面,既有社交圈的萎缩以及趋向新社交圈的转移不可避免。考察老年群体问题,离不开健康和社交这两大主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7月15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老年人健康快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强调了向老年人普及健康知识的重要性。而老年人健康信息传播活动的展开效果,有赖于社交活动的中介作用。社交网络的规模、质量与类型都很有可能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影响^①。

近年来,老年群体的社交平台逐渐向新媒体迁移,且增率渐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老年网民(60岁及以上)群体已经达到中国网民的6.6%,一年时间就增长了1.4个百分点,互联网继续向高龄人群渗透。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和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等在2018年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聊天(71.3%)、看新闻(68.2%)、听歌追剧(50.4%)是该群体最主要的三种上网活动,其中超过八成的被访者常通过社交软件和子女联系。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是该群体获取网络知识的重要渠道,77.1%的老年网民会在此类社交平台上获取信息。尽管,老年网民规模增长较快,但面对网络良莠不齐的信息时,其依然难免陷入新媒体“难民”的困境,成为虚假信息的重灾区。《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中老年网民认为自己甄别网络风险能力一般,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对食药及生活常识谣言不了解,但他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又较大。因此把握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特征,对其健康信息传播进行有效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尝试以微信平台为例,探讨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和传播存在哪些特点?媒介使用及社交特点会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进而思考其干预路径,帮助老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更多地增能获益。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媒介接触与健康信息认知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地区或国家居民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②当代健康传播的研究始于1971年美国医疗专家和传播学者合作推进的“斯坦福心脏预防计划”。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的主要研究人员还集中在医学和卫生专业领域^③,直到2003年SARS爆发时期,传媒类健康传播论文比例在10年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过医学类论文^④。

随着社交媒体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内爆炸式的增长,健康传播研究逐渐发生了从宣传到对话、从信息流到关系网、从利益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范式转换^⑤。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多样性给受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不同的媒介由于其传播特点的差异会对受众的阅读习惯及阅读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谈及“媒介即讯息”时曾提到: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⑥。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亦提出了“媒介即认知”的观点^⑦。

①E. Y. Cornwell & L. J. Waite, “Social disconnectedness, perceived isolation,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50, 2009, pp.31—48; 吴敏、李士雪、Ning Jackie Zhang等:《独居老年人生活及精神健康状况调查》,《中国公共卫生》2011年第7期; 邢采、杜晨朵、张昕等:《老年人社交网络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健康型社区建设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E. M. Rogers,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38, 1994, pp.208—214.

③韩纲:《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喻国明、路建楠:《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

⑤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6期。

⑥[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⑦[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作为大多数人的信息来源,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时时刻刻形塑着人们的认知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思考方式,不同媒介的特性对个人认知的影响甚至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①。换言之,人们在使用工具的同时也在被工具所改变^②。

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下的老年人倾向于用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并寻求信息,随着其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其社会融入感亦会相应提升^③。掌握更多的电脑技术可以让老年人变得更独立,更善于交往,更多地掌握健康知识^④。Elizabeth和Sharon在研究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时发现,互联网不仅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健康信息资源,对他们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的提高也有益处^⑤。当然并非所有相关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积极的效果^⑥。

但也有研究表明,人们在深入阅读时更偏向纸媒,而在浏览时更偏向数媒^⑦。这种基于屏幕阅读的偏好一旦呈现,会造成深入阅读的减少以及持续注意力的下降^⑧。这对于身为“数字难民”的老年群体亦不可避免^⑨。作为积极的信息寻求者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健康意识”^⑩,但他们对健康信息的判断和选择能力仍比较薄弱^⑪。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015年发现,除非拥有足够的健康知识和电子健康素养,大多数人还是会采用未经证实的健康信息^⑫。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网上健康信息检索模式和可信度问题的研究中发现,调查对象会自动信任网络健康信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医疗信息在放上网之前都会有人检查。互联网上的健康信息虽然容易获取,但其提供的健康信息良莠不齐,信息质量问题亟待解决^⑬。网上诈骗、个人信息泄露、虚假信息等都影响着网络环境的健康,亦潜在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同媒介偏好会对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正负向度有待具体检测。

(二) 社交特征与信息认知

社交参与是影响老年人信息认知的重要因素^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已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共识^⑮。邬沧萍、杜鹏等人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概括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

①喻国明、李彪、丁汉青等:《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关于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的脑认知机制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1期。

②陈然:《被媒介技术改变和未改变的人类生活——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再解读》,《今传媒》2015年第12期。

③J. Erickson & G. M. Johnson, “Internet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ness during late adulthood”,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vol.30, 2011, pp.197—209.

④T. Heart & E. Kalderon, “Older adults: Are they ready to adopt health-related IT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vol.82, 2013, pp.209—231.

⑤E. Manafo & S. Wong, “Exploring older adults’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 vol.44, 2012, pp.85—89.

⑥H. White, E. McConnell & E. Clipp,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providing internet training and access to older adults”, *Aging & Mental Health*, vol.6, 2002, pp.213—221.

⑦Z. Liu,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reading behavior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vol.61, 2005, pp.700—712.

⑧Z. Liu,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reading behavior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5.61(6): pp.700—712.

⑨M. Prensky,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 *On the Horizon*, vol.9, 2001, pp.2—6.

⑩E. Manafo & S. Wong, “Exploring older adults’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 Behavior*, 2012, 44(1): pp.85—89.

⑪L. Robertson-Lang, S. Major & H. Hemming, “An exploration of search patterns and credibility issues among older adults seek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vol.30, 2011, pp.631—645.

⑫S. Quinn, R. Bond & C. D. Nugen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eHealth literacy and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19th Annual Health Promotion Conference, 2015.

⑬邓胜利、付少雄、陈晓宇:《信息传播媒介对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的影响研究——基于健康素养和信息检索能力的双重视角》,《情报科学》2017年第4期。

⑭L. F. Berkman, T. A. Glass & T. Seeman, “From social integration to health: Durkheim in the new millennium”,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51, 2000, pp.843—857.

⑮陆杰华、李月、郑冰:《中国大陆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自评健康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CLHLS数据的检验》,《人口研究》2017年第1期。

方面的内容^①；孙晋富、李宗华则从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出发，将社会参与的范围界定为一切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活动^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际互动和交流方式。“它使人们通过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方式开展远程交流互动，或即时或延时，交往频率自主控制。持续交往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虚拟社区’或‘虚拟空间’，成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特殊社会互动场所。”^③当然，虚拟空间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互联网社交对群体认知或信息鉴别的影响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在目前的一些研究结论中，关于老年人的社交特征及其信息认知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能达成一致。

一部分研究从活跃理论出发，指出互联网社交为群体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渠道，因此其对于群体的信息认知具有正面效应。关于如何使老年人在年岁渐长的过程中顺利过渡，建构起其新的意义脉络，进而实现自身角色与心理的统合，活跃理论从个体行为的社会适应性出发，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较高的融入程度可以给老年生活带来正面效应，即若老年人能以积极的状态投入老年生活，参与多种社会活动，积极维持、建构社会联系，那么其老年生活将更为顺畅^④。社交活动伴随着知识的储备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被认为能给群体的信息认知能力加分^⑤。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与亲朋好友的频繁接触可以在提高记忆容量的同时减轻对自身记忆力的焦虑^⑥。较高的认知方式评分CLS (Cognitive Lifestyle Score) 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功能具有保护作用^⑦。朋友聚会等社会活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具有提升作用^⑧，而认知功能的减弱与生活方式参与度的下降有关，尤其是社会活动^⑨。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还曾经对平均年龄80岁的老年人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发现，与不经常进行社交活动的人相比，经常进行社交活动的人的认知能力下降率平均低了70%^⑩。上述这些研究表明，社会脱离和较少的社交活动是造成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危险因素。

但亦有部分研究得出了较为相反的结论：互联网社交带来的群体内卷化取向可能导致信息的偏向，进而对群体的信息认知产生负面效应。Marja J. Aartsen, Carolien H. M. Smits, Theo van Tilburg通过对2076名55—85岁的受访者进行为期6年的研究后发现，社交活动并不能增强他们的认知功能。互联网社交让兴趣相投的群体得以便利集合^⑪。但在同质化的群体中，互动有可能被限制在与我们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同的范围内，这种狭隘的社交容易导致态度和意见的极化^⑫。从群体心态的角度来看，

① 郭沧萍、杜鹏、姚远等：《社会老年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4—365页。

② 李宗华：《近三十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

③ 燕杰、雷鸣：《虚实之间：社会资本从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的转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④ G. L. Maddox, “Persistence of life style among the elderl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tterns of social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life satisfaction”, In B. L. Neugarten (Ed.), *Middle Age and Aging: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p.181—183.

⑤ R. E. Marioni, A. van den Hout & M. J. Valenzuela, “Active cognitive lifestyle associates with cognitive recovery and a reduced risk of cognitive decline”,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vol.28, 2012, pp.223—230.

⑥ F. C. J. Stevens, C. D. Kaplan & R. Ponds, et al., “How aging and social factors affect memory”, *Age and Aging*, vol.28, 1999, pp.379—384.

⑦ M. Valenzuela, C. Brayne & P. Sachdev, et al., “Cognitive lifestyle and long-term risk of dementia and survival after diagnosis in a multicenter population-based cohort”,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173, 2011, pp.1004—1012.

⑧ 易伟宁、康晓平：《中国高龄老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的多水平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年第7期。

⑨ B. J. Small, R. A. Dixon & J. J. McArdle, et al., “Do changes in lifestyle engagement moderate cognitive decline in normal aging? Evidence from the Victoria longitudinal study”, *Neuropsychology*, vol.26, 2012, pp.144—155.

⑩ B. D. James, R. S. Wilson & L. L. Barnes, et al., “Late-life social activity and cognitive decline in old ag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vol.17, 2011, pp.998—1005.

⑪ M. J. Aartsen & C. H. M. Smits, “Theo van Tilburg, et,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 Cause or consequence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everyday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vol.57B, 2002, pp.153—162.

⑫ M. Parsell, “Pernicious virtual communities: Ident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Web 2.0”,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10, 2008, pp.41—56.

这种聚集在一起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相同的心理倾向和趋势与人在个别独处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①按照自我复制的逻辑进行扩散的内卷化过程,很容易产生诸多悖论现象,从而无法进行自我认知的提升^②。

本研究将参照活跃理论的概念,以活跃程度为指标,来探索老年群体的社交特征对其信息认知的影响。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2:老年群体的社交特征会对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正负向度有待具体检测。

三、数据及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于2019年1月至6月其间在南京、苏州、常州、南通、盐城等地针对城市老年群体展开调研。调查范围覆盖苏北、苏中、苏南区域。调查对象均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相对较低,因此在调查时主要由问卷发放员根据问卷内容向老年人提问并记录他们的答案。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576份,其中有效问卷490份,有效问卷率为85.1%。研究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

表1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样本特征	人数 / 人	占比 / %	样本特征	人数 / 人	占比 / %
性别			婚姻状况		
男性	241	49.2	未婚	4	0.8
女性	241	49.2	已婚	410	83.7
未选	8	1.6	离异	16	3.3
年龄			丧偶	48	9.8
60~64岁	192	39.2	未选	12	2.4
65~69岁	146	29.8	月收入		
70~74岁	85	17.3	1000元以下 (含1000元)	49	10.0
75~79岁	38	7.8	1000~3000元 (含3000元)	185	37.8
80岁及以上	23	4.7	3000~5000元 (含5000元)	139	28.4
未选	6	1.2	5000~10000元 (含10000元)	84	17.1
文化程度			10000元以上	23	4.7
小学以下	35	7.1	未选	10	2
小学	89	18.2			
初中	149	30.4			
高中或中专	135	27.6			
大专	40	8.2			
大学及以上	37	7.6			
未选	5	0.9			

本研究样本男女比例为1:1;从年龄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于60~74岁之间;文化程度集中于小学、初中和高中段;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士占比83.7%;被访者月收入集中在1000元至5000元。

(二) 变量定义与赋值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老年群体对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度。通过列举不同类型的虚假健康信息,让调查对象勾选相应的信任程度来检测。信任程度赋值为“完全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

①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②王琛:《“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一般信任=3、比较信任=4、完全信任=5”，得分越高代表对该标题越信任，也说明健康信息鉴别能力越弱。

2. 解释变量

(1) 媒介偏好

本研究在问卷中列举了几种常见的媒体，并让调查对象根据在生活中实际的使用频率进行勾选，分别赋值为“从不使用=1，偶尔使用=2，有时使用=3，经常使用=4”，数值越高表明使用偏好越明显。

(2) 活跃程度

“活跃程度”一词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指代含义和衡量标准。例如对网络平台活跃用户的衡量，目前普遍会通过访问次数、访问时长、收藏指数和相关影响因素这几个维度来判断用户的活跃情况。本研究针对调查对象的特点，将活跃度做了线上和线下的双重考察。为了测试调查对象的线下活跃度，研究尝试在问卷中加入量表，通过列举一些老年人可能进行的现实活动，例如跳广场舞、参加同学聚会、参加棋牌活动等，并让他们根据近半年来参加这些活动的频率进行勾选，赋值为“从不参加=1、偶尔参加=2、有时参加=3、经常参加=4”，分别获取他们参与每项活动的数据，并以平均值来代表他们的现实活跃度，数值越高说明他们在现实中越活跃。线上活跃度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微信活跃度”，它的衡量标准界定为“参与时长”和“参与程度”两方面。“参与时长”指用户使用微信的时间。在问卷中设计了“您使用微信有多长时间了？”以及“您每天使用微信多长时间？”这两个问题，同样将四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以便于之后的数据分析；“参与程度”的衡量包括用户对微信各项功能的使用程度（例如文字聊天、阅读公众号、点赞朋友圈等等），数值越高说明他们在微信中越活跃。

除此之外，本文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个体基本信息亦纳入考察范围。相关变量描述及衡量指标详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及衡量指标

变量类型	名称	衡量指标	
因变量	健康信息的鉴别能力	列举微信虚假健康信息的标题，如： 《100岁老人告诉你长寿的秘诀》 《缺它比缺钙严重万倍！导致中风、痴呆……现在知道还不晚》 《一分钟测出你的健康状况有没有亮红灯》 《这7种肉比砒霜还毒！吃货止步……》 《家长注意了，新型毒品！专门针对儿童，千万当心，看到必转！》 了解调查对象能否鉴别其真假	
控制变量	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	
自变量	媒介偏好	报纸、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使用频率	
	活跃程度	线下活跃度	列举老年人可能参加的线下活动，分别为： 跳广场舞 参加同学聚会 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 加入合唱团 参加棋牌活动 参加健康讲座 结伴旅游 参加社区或其他机构组织的其他老年活动
		微信活跃度	微信使用时长 微信功能使用熟练程度

四、研究发现

（一）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获取多通过网络社交功能实现

在本研究中,63%的受访者使用微信超过一年,其中20.1%的老年人使用微信超过四年。在微信的各种功能中,受访者对于各项聊天功能的使用最为熟练,熟练度均超过2.3;而订阅公众号功能的熟练度均值为1.69,阅读公众号功能的熟练度均值为1.93。在各类健康信息中,受访者对于生活习惯建议类的健康信息最为关注,其次是与自身疾患有关的类型和饮食、食疗类,最不关注的类型则是与情绪或心理相关的(如表3)。

受访者中,有接近90%的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较高,其中26.9%的受访者非常关注健康信息,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主动搜索;62.9%的受访者表示关注健康信息,但不会主动搜集。当被问及通过微信阅读健康类文章的主要途径时,35.9%的受访者表示通过朋友圈阅读,22.2%通过好友转发来阅读,而通过订阅微信公众号来阅读的仅占18.5%。

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获取较为依赖其社交网络,这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老年群体对于熟人圈子的信任度较高,因此源自既有社交圈的信息传播对他们而言可信度更高;二是老年群体对于聊天以外的微信功能熟练度不够,因此一些更加专业且更具针对性的公众号信源难以到达该群体。

表3 调查样本对健康信息的关注类型

排名	类型	占比/%	排名	类型	占比/%
1	生活习惯建议	24.1	6	体育健身	8.5
2	与自身疾患有关	19.9	7	情绪或心理	5.1
3	饮食或食疗	19.4	8	不关注	2.1
4	中医知识	10.4	9	其他	0.3
5	提示疾病征兆	10.2			

（二）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老年人对于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准确度与控制变量、媒介偏好以及活跃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鉴别分值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个案数
控制变量			
性别	.009	.839	490
年龄	.033	.468	490
文化程度	-.056	.219	490
自评健康状况	.017	.702	490
媒介偏好	.125**	.006	490
活跃程度			
现实活跃度	.120**	.008	490
微信活跃度	.193**	.000	490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1.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准确度无显著影响

尽管在之前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存在影响,例如周裕琼在研究中发现,女性的微信采纳比例是高于男性的,年龄也可能影响老年人的微信使用及信息认知^①。但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变量对老年人的微信采纳及信息鉴

^①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8期。

别有显著影响。研究数据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自评健康状况与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准确度的双侧显著性水平Sig值分别为0.839、0.468、0.219、0.702,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 纸媒使用偏好明显的老年人对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准确度相对较高

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老年人经常接触的媒介由多到少依次为:电视、手机、报纸、广播和电脑;曾经在老年人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报纸、广播的接触频率已被电视、手机的接触率远远地抛在后面。手机超越纸质媒体成为老年人日常接触的第二大媒体(如表5)。

表5 媒介接触频率

排名	接触媒介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 %
1	电视	353	39.8	82.1
2	手机	281	31.7	65.3
3	报纸	93	10.5	21.6
4	电脑	88	9.9	20.5
5	广播	72	8.1	16.7
总计		887	100.0	206.3

本研究将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与其对于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分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从受访老年群体对于虚假健康信息的判断均值来看(均值越高,对于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准确度越低),偏好报纸阅读的老年人对健康信息的判断相对其他媒介偏好的老年人而言更加准确(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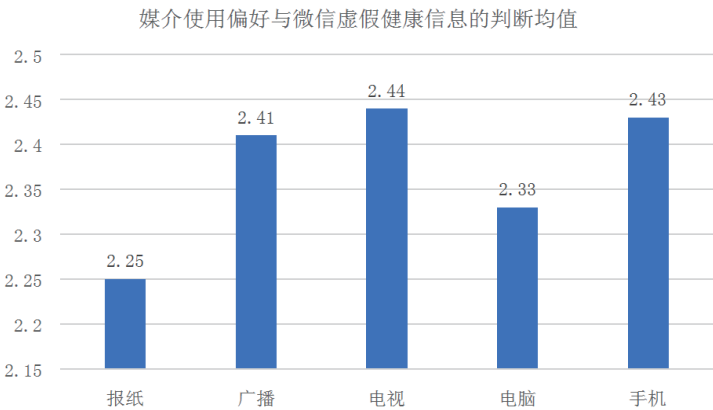


图1 接触媒介类型与健康类标题的信任情况

在此,假设1成立,且保留着纸媒偏好的老年人对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准确度相对较高。

3. 活跃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准确度越弱

本研究结果显示,现实活跃度与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分值的相关系数为0.12,且双侧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008,表明它们之间呈现正相关趋势。由于鉴别分值越高,代表鉴别准确度越低,因此研究结果表明,现实中活跃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对微信虚假健康信息的鉴别能力越弱。这一状况在受访中提到经常跳广场舞或与其他老人结伴外出旅游的老年人身上更为明显。而微信活跃度与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分值的双侧显著性水平Sig值亦提示出明显的相关性(如表4)。综合研究中的两部分数据可以看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活跃度越高的老年人对于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能力越弱。假设2的负向影响得到验证。

如前所述,社交对老年人信息认知的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社交活动带来的知识的储备和复杂心理活动,能促进个体信息认知能力的提升;二是过于同质化、频繁的社交,则可能带来茧房效应,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温床,最后甚至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老年群体社交与微信健康信息鉴别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第二种可能性更为突出。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获取多依赖其社交网络。但不论线上还是线下,老年人的社交圈范围大多有限,通常集中于同辈好友及

家庭成员的圈子。由于晚辈工作繁忙且代际沟壑的存在,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日常交流有限,因此同辈社交圈是其最为重要的社交场所。这类社交圈往往以同学、知青、广场舞友、老年旅友等名义在线上线下集结,成员间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同质性较高的社交圈内呈现高活跃度,并不意味着社交网络的扩展,有时恰恰带来了另一种信息渠道和认知的窄化。也就是说这些看似社交活跃度高的老年人更易陷入一种知识传播的内卷化状态,从而影响他们的信息判断水平。

在此,假设2成立,老年人的社交特征会对其微信健康信息的鉴别产生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1. 老年群体的新媒体应用聚焦于熟人社交,其网络信息的接触与鉴别对社交网络依赖程度较高。

老年群体在新媒体时代被称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那是什么吸引着中国老年人在数字门槛之前迈开脚步进入新媒体的疆域,是互联网中浩渺的信息,五彩多元的呈现方式,还是突破时空的社交?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中来寻求答案的蛛丝马迹。图2为近十多年来,我国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图中数值陡增的时间节点为2014至2015年间。2014年至2015年之间发生了什么,让老年人在新媒体使用上迈出了这么大的一步?这一年微信推出了红包功能,家庭成员间节假日的红包助兴,让不少老年人也忍不住参与其间。可以说更多地参与互联网社交,尤其是家庭内社交的初衷开启了中国老年人的新媒体之路。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群体的新媒体应用依然聚焦社交功能,当然这里的社交已从最初的家庭内部,拓展到了同辈群体、发小旧友、社区邻里等层面。超过70%的受访老年人会使用发送和接受红包功能,这是所有微信功能中老年人熟练度较高的功能之一。

作为一种熟人社会的小圈子文化^①,微信的熟人社交特点在老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平时最频繁联系的对象是子女、配偶、同事和同学。通过微信,他们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在任何地点与家人、朋友进行交流,借此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抑或是努力不与社会脱节。他们在新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最初可能会存在畏惧心理,但在尝试中同样也在发掘乐趣。不过,相对于社交功能,多数老年人对于新媒体的其他功能认知有限。这可以通过施拉姆的媒介选择概率公式来理解:媒体选择几率(P)=媒体产生的功效(V)/需付出的代价(C),一种传播媒介是否会被选择和接受,与受众能从中得到的回报大小成正比,与受众获得媒介服务的费力程度成反比。多数老年人对于新媒体中的其他功能多少抱有一些畏难心理,其在网络中主动探索信息的行为较少,更多的是依赖便捷的网络社交功能,通过他人的转发与分享来获得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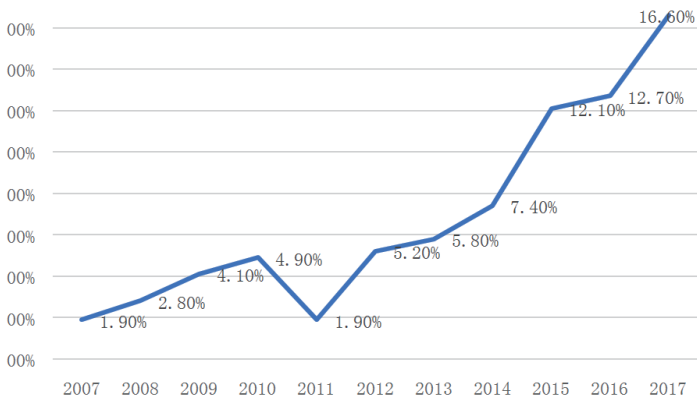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60岁以上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周裕琮,2018)

①曾一果:《由陌生社会回归熟人社会:微信中的新圈子文化》,《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2. 媒介偏好及其对个体认知模式的形塑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鉴别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下老龄化的社会环境相较于先前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许多服务与资源的获取都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①从媒介丰富度的理论视角来看,媒体丰富与否是伴随着技术所带来的固有属性,如果一种媒体能够确保及时反馈,采用多元渠道,传递多元线索,那么它在沟通中就更为有效。毋庸置疑,数字化平台的丰富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的媒体,集成了多元的信息来源,因此,信息供给的不足或者不对称已经不是老年人媒介信息认知与鉴别中的首要问题。媒介的使用偏好及其形塑的认知模式在老年人的信息鉴别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媒介特点来看,虽然纸质媒体的传播时效性和信息丰富度不如手机等新媒体,但是公信力仍是它的一大优势。目前,绝大多数纸质媒体仍保有一套相对严密和科学的新闻采编及发布流程,在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方面是远远超过新媒体的。正是由于纸媒的内容生产过程更为严格,信息挖掘更为深入,所以能提供更多有深度的阐释性信息,有利于帮助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其次,从各类媒体的传播认知特征来看,不同媒体实现的是不同的认知活动。人们在使用新媒体和电视媒体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扩散性的脑活动,脑中放射的是阿尔法波,其思考的方式是不专注的、感性的、自然的状态,读者处于“浅阅读”的层次,信息潜移默化的渗透式影响来得也更为深入^②。而当人们进行阅读时,脑中发出的是贝塔波,其思考的方式是警觉和有意识的分析状态,带有更为理性的判断。偏好新媒体的老年人惯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获取大量的信息,但这也让阅读形式趋向碎片化和表面化,打断了深入思考的环节,依赖于具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从而导致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下降。偏好电视或新媒体的老年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获取大量的信息,但这也让阅读形式趋向碎片化和表面化,打断了深入思考的环节,依赖于具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从而导致对信息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

3. 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传播中的高度社交依赖,容易引发信息认知的内卷化,亟待量身定制式的信息干预。

在复杂的网络语境下,虚假健康信息层出不穷。老年群体缺乏有效的指导和信息干预,面对一些与自身或家人健康有关的信息时,往往会抱着一种“不妨一试”的心态。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群体最常用的信息鉴别方式就是通过信源来鉴别。但这里的信源并非权威专家,而是生活中的“周围人”。相较于互联网上不知来源的内容,他们更愿意相信由周围人的确认或转发的信息,这些“周围人”构成了老年群体认知图景中的“重要他者”。也就是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的判断高度依赖他们的既有社交圈,这就容易引发认知的内卷化问题。

“内卷化”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的,后来被格尔茨在研究一个农业发展项目时继续沿用,是指一种不断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的过程,逐渐在内部形成一个密集坚实的“内核”,在外部形成一个难以突破的刚性“外壳”^③。结合本研究的情境可以发现,老年群体的社交网络具有较高的同质化,而身处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内有可能会增加偏见。一个群体内不再需要中心化协调,而仅仅通过学习和模仿,个体之间观念或行为表现就会呈现出一致性^④。信息接收者在群体内的活跃度越高,就越倾向于与大多数人的行为和判断标准保持一致,进而减弱了自己的原创性和主体意识,成为健康谣言滋生和传播的下一个节点。也就是说老年人越是沉浸于社交媒体,就越可能出现被虚假信息误导的情况。作为对媒介依赖度较高的群体^⑤,老年人在面临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多样的健康信息

①C. A. McMellon & L. G. Schiffman, “Cybersenior empowerment: How some older individuals are taking control of their live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vol.21, 2002, pp.157 - 175.

②[美]凯特·穆迪,《电视的影响与儿童电视病》,栗秀云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③王琛:《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④R. M. Raafat, N. Chater & C. Frith, “Corrigendum: Herding in huma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13, 2009, pp.420—428.

⑤丁卓菁:《新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媒介素养教育探讨》,《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时,缺乏有效的指导,很容易出现信息误读或被虚假信息迷惑的情况。这也提示我们,关注和干预该群体的数字媒介素养已经刻不容缓。

数字媒介素养主要包括“使用文本、工具和技术,批判性思维和分析的技巧,信息构成和创造力的实践,参与反思和道德思考的能力以及通过团队合作和协作积极参与”^①。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使用工具和技术、批判性的思维和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干预在当下意义更大。通过上述这两个层面的干预,一方面可以解决由技术障碍导致的有限信源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对于虚假信息的盲听、盲信、盲从问题。

当然,在对老年群体进行媒介素养干预的过程中,不可一以概之。老年是个宽泛的概念,老年群体在思维能力和人格特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不仅与生理上的变化有关,更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正如埃里克森对于老年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阐释,个体进入老年阶段以后,从社会舞台的中心逐渐退场,他们需要从自身在青年、中年期形成的角色模式中抽身以适应社会对于老年人角色模式的定义,他们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去适应这些挑战,对自身进行新的整合与接纳。针对老年群体的信息干预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和兴趣量身定制,而不是一味要求老年人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②。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The Urban Elderly's Contact with and Judgement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Wechat

ZHUANG Xi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the old age means a transfer and reform of self-role. The process of growing old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losing control of the body gradually, but also a process of shifting the existing social circle to a new one. Therefore, health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are two major topics in studying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old people. Recently, social platforms for the elderly have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new media, showing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ir application. When faced with the mixe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elderly are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the new media, hence a group of new-media “refugees”, who are reduced to the victims of the disaster of fals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ake Wecha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s contact with and judgement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is platform, so as to help them benefit from social med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derly focus their use of the new media o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acquaintances, whose access to and judgement of the online information highly rely on the social network; their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Wechat platform among the elderly is easy to cause involution in their cognition; and their digital media literacy is severely weak, which requires urgent customized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Key words: the urban elderly; Wechat; health information; level of activity; media preference

About the author: ZHUANG Xi,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①汪怀君:《后真相时代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②J. Bennett,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 activation, moti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ersons aged 60 and over”, 2011, http://thirdageonline.eu/wp-content/uploads/2011/11/tao_preliminary_study_60_plus_literature_review_20111103.pdf.